

医院里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我的父亲是一位外科医生,母亲是内科医生。我没有见到过我的祖父和祖母,他们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而我的外公和外婆则居住在别的城市。在我的记忆里,外婆从来没有来过我们的县城,只有外公隔上一两年来看望我们一次。

与很多我的同龄人不一样,我和我哥哥没有拉着祖辈们的衣角长大,而是在医院里到处乱窜,于是我喜欢上了病区走廊上来的苏水的气味,而且学会了用酒精棉球擦洗自己的手。我经常看到父亲手术服上沾满血迹地走过来,对我看上一眼,又匆匆走去,繁忙的工作都使他不愿意站住脚和我说上一两句话。这方面我母亲要好些,当我从她的内科门诊室前走过时,有时候她会叫住我,没有病人的时候我还可以在她身边坐上一会。

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我记得一座木桥将我父母工作的医院隔成两半,河的南岸是住院部,门诊部在河的北岸,医院的食堂和门诊部在一起。夏天的傍晚,我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有时会坐在桥栏上聊天。那是一座有人走过来就会微微晃动的木桥,我看着父亲的身体也在晃动,这情景曾经让我胆战心惊,不过夏季时晚霞让河水泛红的景色至今令我难忘。我记得自己经常站在那里,双手抓住桥栏看着下面流动的河水。我在河水里看到了天空如何从明亮走向黑暗的历程。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父亲上班时让我跟在他的身后,他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着,而



名人博客

新浪网博客频道

北京燕山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是从各行各业名人的网络日记中精选的性情文字,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人生中诸多现实而永恒的话题。脱下明星的包装,走出名人的光环,卸下智者的头衔,也许,只有在日记中,“平凡人”的角色才能得到真实的还原——至少,是相对的真实……

我必须用跑步的速度才能跟上他。到了医院的门诊部,他借了医院里惟一的一辆自行车,让我坐在前面,他骑着自行车穿过木桥,在住院部转了一圈,又从木桥上回到了门诊部,将车送还以后,他就走进了手术室,而我继续着日复一日在医院里的游荡生活。这是我童年里为数不多的奢侈的享受。

在医院游荡的时候,有一次我和我的哥哥偷了手术室的记事本,那是一本硬皮的记事本,我们并不知道它的重

要,只是因为喜欢它坚硬的封皮,就据为己有。那时候的人生阅历已经让我们明白不能将它带回家,于是我们在手术室室外撬开了一块铺地,将记事本藏在了下面。结果引起了手术室一片混乱,他们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年的记录,有几天他们翻箱倒柜地寻找,我哥哥也加入了进去,装模作样地和他们一起寻找。我哥哥积极的表现毫无用处,当他们意识到无法找回记事本时,就自然地怀疑起整日在那里游手好闲的我们。

于是审问开始了,他们先从我哥哥那里下手,我哥哥那时候已经知道问题有多么严重了,所以他坚决否认,一副宁死不屈的模样。接下来就轮到我了,他们叫来了我们的母亲,让她坐在我的身边,手术室的护士长说几句话就会去看我的母亲,我母亲也就跟着她的意思说。有几次我差点要招供了,因为那个平时很少理睬我们的护士长把我捧上了天,她说我聪明、懂事、听话、漂亮,凡是她想起的赞美之词全部用上了,我从来没有一下子听到这么多甜蜜的恭维,我被感动得眼泪汪汪,而且我母亲的神态似乎也在鼓励我说出真相。如果不是我哥哥站在一旁凶狠地看着我,我肯定抵挡不住了,我实在是害怕我哥哥对我秋后算账。

后来,他们很快忘记了那个记事本,就是我们这两个主谋也忘记了它,我想它很可能在那块正方的地砖下面腐烂了,融入到泥土之中。当那个护士长无可奈何地站起来时,我看到自己的母亲松了一口气,这情景时隔三十多年以后,依然不时栩栩如生地在我眼前浮现出来。 余华 / 文

一份拼接而成的红军档案:长征之前

1934年开始长征的红军经过国民党部队连续五次的“围剿”,已经元气大伤。新补充的农民出身的战士占了绝大部分。这些战士的内心或许充满了仇恨和革命的浪漫情怀,但他们走在一起,从外形上看,却并不像一支正规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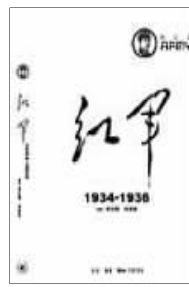
英国籍传教士R·A·勃沙特在贵州境内曾路遇长征中的红军。他这样描绘第一眼遭遇到红军的场景:“这些人都戴着相同的帽子和佩戴着红色标志。帽子的顶很大,有点像西方赛马骑师帽。他们穿的衣服则很杂乱,简直一个人一个样。他们来自乡下的小村,衣服是随手弄来的而又根本不注意布料颜色,其中有蓝、灰、紫、绿、黄、黑色等等。”

此时的红军在之前已经经历了无数磨难。人员伤亡,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这是一支军事史上也堪称奇特的部队。从出发前到最后建立新的根据地,红军的人数、打扮、装备在行进途中不断发生变化。

长征出发时的红军战士,大多数在17至30岁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青少年组成,约54%的战士都在24岁以下,而将领的平均年龄也不超过30岁,非常年轻。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士兵大部分为江西籍贯。此外福建和浙江籍贯的红军也占较大比例。在长征期间沿途“扩红”(招收新兵),湖南籍、四川籍、贵州籍的红军不断增多。

参加红军的人的身份有雇农、工人、中学生、小商贩等



纪实文学

师永刚 刘琼雄 著

三联书店友情推荐

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70周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行程,到达陕北。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开始。本书以关注细节、散点式的记录方式为主,涉及了许多以往未曾涉及、关注的内容,诸如红军长征食谱、长征时用过的器物、红军履历、长征中的浪漫主义精神,长征的参加者以及长征中流散各地的红军士兵的命运,等等。

等,绝大多数是农民。参加红军的许多人是因为生活艰难、没吃没穿,不愿受压迫。当然也有一些逃婚以及讨厌了在古老的农村生活的一些乡绅,只有极少数的人相信他们是为了寻找革命真理。

红军主要是步兵,只有少量的骑兵、炮兵、工兵及通信兵分队。当时的组织体制和编制也不统一,通常是按方面军、军团、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的序列和“三三制”进行编组。武器装备则主要取

之于敌,使用缴获的步枪、机枪、轻型火炮和自制的长矛、大刀等古老兵器同敌人作战。在建军之初,红军废除了封建雇佣军队的管理方法,实行人民军队官兵平等、经济公开的民主管理制度。

据1934年春季的一次统计,红军第一方面军的阶级构成是工人占30%,农民占60%以上,其中农民中的大多数(不少于77%)来源于苏区当地,而国民党的逃兵和叛兵不超过4%。创建于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之时的最初的红军由前国民党官兵、游民、贫苦农民等组成。

上世纪30年代初,红军的发展令人惊异,每年的数量翻倍递增。《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记载关于红军的数字:“根据各种估计,1930年,红军总数约有5万人,1931年增加到10万人以上,1932年增至20万人,1933年增至50万人。”

在1934年,红军的政治身份比例是这样的:中共党员和非党员分别为28%和72%。而按照毛泽东当时认为的最佳比率应该是1:3。

参加长征的红军,绝大多数为男性,中央红军中只有30名女性红军干部以及少数的女护士和女勤务兵,而红四方面军另有一个妇女独立师,兵力近3000人(长征后减员至2000左右,缩编为妇女独立团)。按照这样的数字,长征期间的红军男女比例为90:1。

参加长征的红军中,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3:1(据李德的回忆)。

暗恋

罗小云不会画画。据钟庆东观察,她也不喜欢画画。虽然她很美,然而她跟画画这种美的基本形式——似乎无缘。钟庆东眼下就读的这所高中,即使在他身处的县城,也不是什么好高中。说白了,它是一所职业高中。钟庆东来到这里,意味着他得学三年的职业性技能,以便日后在社会上安身。事实上,钟庆东早在初中时学习成绩就已经因偏科而开始下降,他喜欢上了画画。钟庆东听说罗小云当初考县里的重点高中,只差了两分,无奈之下才来到职业高中的美术班。她也许就是觉得美术班气氛相对宽松,时间也充裕,适合她一心钻研文化课而将来投考综合性大学吧?这样的人在班级里倒也有几个。

美术老师经常安排同学们素描,石膏写生。同学们画大卫、海盜、巴尔扎克等人的石膏头像,以此训练对线条和比例的把握。有一次,老师还安排了罗小云做肖像模特,这引起了钟庆东内心里稍稍的不满。在那间明亮的画室里,罗小云在前面足足坐了两个小时,这使得全班男生的目光都得以有恃无恐和专注地打量她。钟庆东感觉这好比一颗混在鱼目中的珠宝,突然被人无意中挑出来示众一样,令真正喜欢它并心怀一测的人惶惶不安。一向下笔神速和准确的钟庆东接下来发现自己根本画不好罗小云,无论他修改了多少稿,画得多么认真,都和现实中的罗小云相差太远。那天他弄明白一个道理,对他而言,如果能够完整传神地画下罗小云,那罗小云的美



都市小说

于晓威 著

收获杂志友情推荐

高中三年,钟庆东一直专心暗恋着同班的美女罗小云。罗小云幸运考取外地一所大专院校,钟庆东高考失败,自此两人断了联系。时光流转,他们再次相遇,半年后,他们结婚了。可是,他们的婚姻似乎验证了一句名言:无论你结婚还是不结婚,你都将为之后悔……

就值得怀疑了。

钟庆东每天都是怀着对一种特殊情感的向往和对一个人隐秘依恋的混合发酵的珠宝,突然被人无意中挑出来示众一样,令真正喜欢它并心怀一测的人惶惶不安。一向下笔神速和准确的钟庆东接下来发现自己根本画不好罗小云,无论他修改了多少稿,画得多么认真,都和现实中的罗小云相差太远。那天他弄明白一个道理,对他而言,如果能够完整传神地画下罗小云,那罗小云的美

面上放着一个练习本,他随意地翻了翻。她的字写得又大又乖张,很不成体,一点儿都不够温柔流畅,换一个并不像钟庆东那样已对罗小云深怀好感的人看了,会觉得写字的人是一个粗糙马虎、缺乏恒心、教养低下的人。但是那天中午在钟庆东看来,这简直就是他看到过的最标准的字。

春天来了,美术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到野外写生。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从素描转到对色彩的训练了。罗小云在远处和几个女同学嬉闹着,她穿着水蓝色的牛仔裤,绛红色薄绒衣,全身洋溢着暖融融春天般的气息。钟庆东很想和她走在一起,但是他不敢。那时候,风从远处吹来,经过了罗小云,钟庆东感谢风,他想,是风让我接近了她,风也使得我拥抱了她。

这种无数的日常细节折磨着钟庆东,并锻炼了他的想象,让他痛苦也让他幸福。他觉得只要有罗小云在的地方,那他们相处的每一个细节都跟钻石的棱面一样闪闪发光。他不知道他这样的思想有多么矛盾,因为罗小云时常的还要跟别的男同学打趣,或是连续好几天都不看他一眼。他记得有那么一次,植树节,也是在城郊。罗小云和班里的另外几位男生分在一组劳动,配合得那么默契,同时她也显得那么快活,欢声笑语不断。那个时候,钟庆东就弄不清了,罗小云是故意让他看见了吃醋?还是她跟他产生的一切所谓默契的细节,跟别的男生也有?在钟庆东看来,也许罗小云这个人的一言一行妙就妙在不可捉摸。

寻宅启事

吃过早餐,我装着一副悠闲的样子在镇上逛着。古镇上的游人并不是太多,毕竟“十一”长假快结束了,而平凉也不是出名的旅游景点。旅馆转弯处有家小卖部,电视开着,店主人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我也停下脚步观看。屏幕上女主持人表情有些生硬,操着不流利的普通话,一板一眼地说:“……张德方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脑神经学专家,1901年出生于平凉……张德方先生不仅学术上独树一帜,为人也刚正不阿……张德方先生当年的弟子段正文先生有心要重修张先生的祖宅,任何人若能提供张德方祖宅的具体位置,将会得到重酬二十万人民币……联系人:陆先生。”

平凉的空气里飘浮着一股躁动不安。这是我一手策划的,让段先生假托张德方弟子的名发寻宅启事。我也早就预见到会打破这里的宁静,毕竟对于一个经济不太发达的地方来说,二十万元不是个小数目,足够掀起大波浪了。

我的手机响了。只有一句话:“真的有二十万吗?”当我肯定地答是,电话就挂断了。接下去又有无数的电话打进来,也只问了这一句。

渐渐地,问的内容开始变了:“二十万什么时候给,是不是当面?”我知道有人心动了。从上午到下午,不停地接电话,不停地重复回答,我一点不觉得累,感觉自己一步一步地走近关于张德方先生故宅的秘密。

然后,我接到了一个特别的电话,对方的声音很苍老:“年轻人,停止这个广告,离开平凉吧。人死诸事皆空,张德方



悬疑小说

若花 燃燃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大一新生叶浅翠在暑期旅行时遭遇诡异的事情,误入雾宅,亲眼目睹一件杀人案。但是她所指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宅子,连她在雾宅里的同伴魏烈也否认认识她。这令对浅翠心有好奇的心理学的研究生陆林都开始怀疑她的神志。事情很快飞转直下,公安局的机密卷宗揭示一年前确实发生一起杀人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先生也不在乎这身后虚名,何必用金钱在这里掀起风波?”他说到最后,声音有些生气。

下午三点多,我的手机又响了。“今天晚上七点半我来找你,请你准备好钱。”电话那头顿了顿,“我一定会来的,请你不要再跟其他人联系了。”贪婪的人,贪婪的口气。

等待是个艰难的过程,七点半姗姗而来。房里赫然多了一个人,他叫张平树,正贪婪地用手摩挲着一沓崭新的人民币。他应该不到六十岁,头发略有霜白,脸色黑中带红,

看起来身子骨硬朗。

“张大叔,现在可以告诉我们,张德方先生的故宅在哪里了吗?”

张平树眉宇间露出一丝踌躇,说:“那房子早就没了。被火烧了。”我顿时愣住了,如果房子早就不在,那么段瑜与叶浅翠进入的那幢宅子是何处呢?

经历过战乱,老房子有这样的遭遇也不是奇怪的事。“那么房子旧址在哪里呢?”我问。

张平树的目光中一下子变得复杂了,惶恐、犹豫、害怕掺杂在一起。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绝对不可以去那里。那里……那里有鬼。”他字咬得特别重。

尽管我心里早有准备,也被他惶恐低沉的声音吓得心突突跳。我心中一动,深感事情的复杂性超出我的预料。“看来张大叔没有跟我们合作的打算,这钱得等下一位朋友了。”

“不是的,不是的。”张平树侧身躲我的手,将钱袋子搂得更紧,“你问,你问,我全告诉你。”

我慢慢地坐回沙发上,点了一支烟,想,从哪里开始切入呢?到现在张德方的故宅及故宅里发生的事情都裹着一团迷雾。我抽到半支烟时,掐灭手中的烟,说:“张德方先生房子里的鬼是张盈吧?”

“啊?你……怎么知道……”张平树果然方寸大乱,搂在怀里的钱袋都几乎跌落了,“是的,一幢老房子,房子里住了两个人,那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就是,张盈……”

张平树苍老的声音,并不细腻的描述,将我与小黄带到了几十年前,带进那些沾了灰尘的旧事里。